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前景

——评《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

刘 丰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假说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往往是不充分和不完全的，而经验现象中也会常常出现与原有理论不相符的异例与反常。理论与现实之间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距离，这也为新的理论突破和创造提供了机会之窗。针对现实困惑与理论反常，理论家们既可以对原有理论假说进行局部修正，来消化这些异例，也可以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由此产生知识的积累，为人们理解现实世界提供帮助。

在新近出版的《没有应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一书中，现实主义阵营的新秀学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兰德尔·斯维勒（Randall L. Schweller）根据历史经验指出传统均势理论面临的一种反常现象——“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并且试图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提供一种清晰的

*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系博士生蒲晓宇在该书甫一出版之际便给笔者寄送，在写作书评的过程中，笔者也曾多次与他就该书的理论命题、实证检验及其政策意义等问题进行交流，在此谨致谢忱。当然，文中错误与疏漏当由笔者自负。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国际政治科学》2007/3（总第11期），第155—168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解释框架，补充结构理论对国家行为的解释与预测的不足。这一研究体现了社会科学理论突破的一般逻辑，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以及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重要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选择，尤其是应对霸权国策略的研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研究中的热点议题。这一研究趋向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变化，即冷战结束之后没有一个大国能够与美国相抗衡，如何应对美国成为体系内其他大国的主要政策议程之一；另一方面，传统上为人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指导的理论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许多学者试图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对于主要大国在面对潜在或实际霸权威胁时的国家行为，传统的均势理论提供了最为明确的论述。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出于维护自身的生存以及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国家对体系中权力分布的变化极其敏感。当体系内出现权力的过度集中时，其他大国倾向于采取制衡的策略来应对潜在或实际的霸权国，以恢复或维持国际体系的均势。有学者就明确地指出，制衡行为是现实主义理论对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保证其生存的行为表征做出的最主要预期。国家的制衡行为可能是内部的，即加强军备、国内动员等，也可能是外部的，即加强和扩大联盟，或者削弱敌对同盟的力量。另外，制衡可能是国家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也可能是被动的、无目的的选择。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18.

这体现了均势人为生成论与自动生成论之间的差异，见 Colin Elman,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Colin Elman and John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rentice Hall, 2003), pp. 10—11.

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观点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国际关系史并不支持制衡是一种普遍国家行为的论断，或者说这种说法对历史具有选择性。这些学者的研究指出，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当面对相对实力变化和外部威胁兴起时，许多国家未能进行及时、有效的制衡。比如，面对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当时仅有英国积极地进行制衡，欧洲大陆国家基本上没有采取有效的抵御；同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面对希特勒德国大肆进行战争准备，当时的欧洲大国普遍采取了绥靖政策。历史学家施罗德（Paul Schroeder）在对近代以来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全面否定了均势理论对历史的解读，他认为大国在面对显著威胁时所采取的策略不能证明制衡是一种主导性的国家行为，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四个主要的大战时期，主要大国采取了典型的非制衡行为。时殷弘也试图证明，历史上主要大国对霸权或其追求的反应远非总是制衡，还包括容忍、规避、屈从和“搭车”等其他行为。

均势理论家们可以辩护说，尽管在权力态势变化的初始阶段，一些大国可能并没有采取制衡手段来对付一个潜在或实际的霸权国，但从历史结果来看，大国之间权力分布的大致平衡最终得到了维持，体系在总体上恢复了均势状态。不过，制衡的缺位或者“滞后”意味着，国家的行为还是常常会偏离均势理论的预测。在那些本应该及时加强军备、国内动员和缔结同盟的情况下，国家可能选择相互推诿、追随强者、逃避等策略。

《没有应答的威胁》一书正是以质疑均势理论对国家行为所作的预期为起点，在其中，斯维勒归纳出四种与制衡有关的国家行为模式，分别是适当制衡、制衡过度、不制衡与制衡不足。制衡意味着受到威胁的国家通过动员、缔结联盟等手段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来阻止或挫败其他国家，而制衡不足是指国家没有采取制衡或者不足以有效地应对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作者在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120—124; Paul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第48—58页。

沃尔兹强调均势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状态，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8.

对国际关系史上的案例加以简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制衡不足是一种普遍的国家行为。由此，该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制衡不足这一现象为何在历史上会普遍存在？国家为什么不能像传统均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审慎地应对外部威胁？

二、制衡不足的国内政治解释

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斯维勒对制衡不足这一现象的解释体现了这一现实主义理论分支的一贯主张，即将国内政治因素作为结构压力与国家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以此来解释国家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如何传导、推动或抑制结构压力，进而做出决策或行动。总体而言，作者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厘清影响国家行为选择的四个国内政治变量。

为了解释制衡不足，斯维勒从众多的国内政治因素中提取了四个影响国家行为的变量，分别是精英共识、精英凝聚力、社会凝聚力以及政府政权脆弱性。首先，精英共识主要衡量精英阶层在威胁性质、程度以及应对方案等问题上的意见是否统一。在面对外部威胁时，精英共识有两种情况可能影响制衡不足，一种情况是精英对威胁的认知存在分歧，采取制衡的意见不占主导，另一种情况则是精英阶层形成了共识，但这种共识是主张采取非制衡行为。其次，精英凝聚力关注的是精英的内部分裂程度，在政治决策层中，精英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地域、部门、党派和阶层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如果精英分裂程度较高，即使存在着对威胁性质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的共识，国家也不大可能采取一致的政策。第三，社会凝聚力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内部的个人和组织的聚合程度，在面对威胁的时候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在扩充军备和国内动员过程中，国家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汲取大量的国内资源。只有得到社会的服从，国家才可能更好地应对威胁。第四，政府政权脆弱性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掌权的精英集团是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p. 46—62.

否受到其他集团的挑战或威胁，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是否得到民众的支持。根据常识，只有稳定的、有动员能力的政府，才可能对威胁作出有效的反应。

国内政治变量纷繁复杂，作者从中加以选择时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注重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上述四个要素既包含了政策的直接制定者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间接影响因素。作者认为，前两个变量（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决定了国家行动的意愿，而后两个变量（社会凝聚力 and 政权脆弱性）决定了国家行动的能力，而这四个变量综合起来共同构成了国家的一致性（state coherence）。就对制衡不足这种现象的影响而言，由于决策总是由政治领导层做出的，政治精英的行动能力和意愿是国家策略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精英阶层对威胁性质、程度以及应对策略等问题能否达成一致，及其受到派系纷争和利益冲突等“内耗”影响的程度，直接决定了采取制衡行为以应对威胁的意愿。而政府的脆弱性和社会凝聚力则影响到精英通过国家机器汲取资源进行制衡的能力。

其次，明晰四个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构建了产生制衡不足行为的五种因果图式。

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简约性，通常试图用最少的变量解释最普遍的现象。由于每一个变量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增加变量无疑会增加分析的复杂性。如果单纯的增加变量而不对其中的逻辑联系加以澄清，就只能是尽可能趋近于经验事实的描述，无助于我们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国内政治变量的加入实际上放宽了传统均势理论中关于国家是一元、自主、理性的行为体的假定，由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其不同组合所产生的影响有所差别，斯维勒在其研究中提供了五种有可能引起制衡不足的因果图式，将四个变量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明确了其中因果链条上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

第一种因果链条式是将四个变量都增加到传统均势理论的逻辑链条中去，形成一个更加细致的因果链，其中，这四个国内变量都是属于同向变化的，要么加强、要么减弱国家的制衡倾向，其详细的因果机制是：相对权力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 47.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p. 62—66.

改变 精英对威胁性质的共识以及精英凝聚程度 政权脆弱和社会凝聚力对动员的阻碍程度 外交政策的延续或变化（比如，制衡、追随、绥靖、姑息等等）。这种图式被称为“常规均势模型”。

考虑到某些因变量可能不会在所有涉及国家制衡行为的情况下都存在或起作用，作者在常规均势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为一般化和简单的表达：外部威胁出现 社会分裂（凝聚）+政府或政权脆弱（稳定）+精英分裂（凝聚） 精英意见不一或者非制衡共识（精英的制衡共识） 制衡不足（制衡）行为。这种图式被称为“叠加模型”，那些以相加方式联系的中间变量可能同时作用，也可能缺省，但是其后续的推理是一致的。

在对单个变量进行分析中，斯维勒指出，对于那些凝聚力和忠诚度较低的国家，社会在面临危机时可能出现分裂，这种图式被称为“极度不团结的国家模型”，其因果机制是：外部威胁出现 社会分裂 政府或政权脆弱 精英分裂 精英对于如何应对威胁意见不一或者精英存在不去制衡的共识 制衡不足以及国家进一步分裂的可能性非常高（比如说内战或革命）。

第四种图式是“多元民主模型”：外部威胁出现 +危机之前高度的社会分裂和政府不稳定 精英形成共识，认为外部环境危险、国家必须采取制衡政策 对于与谁结盟以及制衡谁，精英和社会发生分裂 政府更加不稳定 制衡不足以及不一致的大战略。

在另外一种情况下，精英阶层对威胁的来源和性质有所认识，但是由于国内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了对威胁的低估或者试图用其他善意的表现来减小威胁，作者认为这是所谓的“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由此，第五种图式是“出于一厢情愿的制衡不足”：相对实力变化 精英形成共识，认为外部环境构成威胁 由于政权脆弱性、社会分裂或者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准备、精英分裂的作用，高度动员受到阻碍 由于一厢情愿以及其他导致的偏差，精英共识低估了威胁认知 某种形式的制衡不足、外交政策缺乏变化。

综合以上五种因果图式，作者的核心假定可以概括为：在面对外部威胁和权力变化时，国家的一致性程度决定了国家能否审慎地应对，一致性程度越高的国家越可能采取制衡行为，反之，制衡不足现象出现的可能性越大。由于国家一致性由四个相互联系的国内政治变量组成，只有那些内部稳定、

社会和精英凝聚力高的国家才可能形成精英共识，最有可能以积极、有效的制衡来应对威胁；反之，那些内部不稳定、社会和精英凝聚力低的国家很难达成精英共识，也最有可能产生制衡不足。

第三，对理论假说和因果图式进行案例验证。

在提出理论假说并且明晰其中的因果链条的基础上，斯维勒用两章的内容对其理论阐述加以历史检验和验证。其中一章是关于大国的 3 个案例，另一章是涉及到小国的 1 个案例，这些案例分别是：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对德国扩张的反应；一战与二战之间法国对德国的政策；1877—1913 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对外战略与对德政策，以及 1864—1870 年三国同盟战争期间阿根廷和巴西应对巴拉圭的行为选择。在案例选择上，斯维勒也做了精心设计，他认为，三个大国案例是“关键”案例，因为英国和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希特勒德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法国在一战之前对威廉德国扩张的举棋不定是“制衡不足”这一概念的代表性案例，而这些案例对于传统均势理论而言应该是“最可能的”案例，如果这些案例能够通过检验，一方面意味着验证了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则表明了传统均势理论的缺失。

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斯维勒详细考察了每个解释性变量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组合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主要依靠相关国家的历史档案、外交人物的传记和文献以及相关的历史事实来判断四个国内政治变量的变化。比如，一战以前（1877—1913 年）法国对德国的政策被用来检验“叠加模型”。这个案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中，从 1877—1898 年，法国没有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崛起很好地应对，而是着眼于在欧洲大陆之外的殖民扩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根据斯维勒对当时法国国内政治的详细考察，当时法国的精英集团内部分化为不同的派别，包括殖民主义者与大陆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与君主论者、反教权主义者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多种对立和冲突，由此，精英在外交政策的重心（殖民地还是欧洲大陆）以及威胁来源（英国还是德国）的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另一方面，法国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妨碍了精英从社会汲取必要的资源来用于发展军事，这一时期法国外交政

策主要侧重于低成本的海外殖民扩张。与此同时，当时的法国政权极不稳定，总理和内阁的更替非常频繁。综合来看，当时的国内政治要素发生着不利于国家采取一致的对外政策的同向变化，验证了“叠加模型”。而1898年以后，法国的殖民扩张基本完成，精英阶层的结构发生变化，主张加强军事开支的意见占据主导；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政权稳定性非常高，形成了有利于应对外部威胁的国内政治环境。法国因而先后与俄国和英国结盟、同时在内部扩军备战，采取了有效的制衡策略。此时的变化实际上可以验证“常规均势模型”，其中的因变量都出现了有利于制衡的方向转化。

斯维勒对其他几个案例的考察也基于类似的模式，主要分析了几个变量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的变化，他分别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对德国扩张的反应检验了“出于一厢情愿的制衡不足”，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案例检验了“多元民主模型”，以及用三国同盟战争期间阿根廷和巴西的例子检验了“极度不团结的国家模型”。由此，五种因果图式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历史案例，而这些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也能够印证出作者所提出的因果链条上各个环节的变化。

三、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理论阵营中异军突起，成为最为活跃的分支之一。在斯维勒、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新古典现实主义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具有特定研究内核的

主要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文献有，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研究纲领。相对于现实主义理论传统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结构理论而言，新古典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鲜明特点：首先，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对外政策分析相结合，试图在对外政策这一理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构建简约而科学的理论。其次，将体系诱因与国内政治相结合，力图在诸分析层次之间架构桥梁，改变相互割裂的局面，构建跨层次理论。

然而，从理论化的成熟程度与研究方法的严密性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在评析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时，沃尔特（Stephen Walt）曾经精辟地概括了新古典理论的不足。他认为，由于这一理论回避了仅仅关注国内或体系变量的单因素分析，它更适合于在历史叙事中建构理论；其精于历史细节的描述，主要着眼于对单个国家或个别现象的历史事例进行解释，缺乏一般性推理。如果说新现实主义为了获得简约性和一般性而牺牲了精确性，那么新古典理论则为了获得描述上的准确性和政策上的相关性而放弃了一般性和预测力。以扎卡里亚在《从财富到权力》一书中对美国历史上的扩张行为的解释为例，他将政府能力纳入到传统上现实主义对实力的强调中，认为只有当国家中央政府的决策者认识到国家相对实力上升、并且有足够的力量提取社会资源时，国家才会选择向外扩张。不论扎卡里亚的解释是否成立，这一研究仅是对美国历史上一段时间的扩张行为的研究，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与此同时，除了纳入国内政治变量这一共同点之外，新古典学者的研究缺乏统一的解释变量和理论框架，诸如国家偏好、国内政治结构、决策者的威胁认知等许多变量都被纳入其中，导致有学者提出了“还有谁是现实主义者？”的尖锐质疑。

对这一研究纲领的明确阐述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oach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3), pp. 311—347.

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评析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0—121页。

Stephen M. Walt, "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 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s.,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I* (New York: W.W. Norton, 2002), p. 221.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Jeffery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5—55.

在某种意义上，斯维勒对制衡不足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试图解决这一研究纲领存在的缺陷以及对批评意见作出回应。一方面，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作者对国内变量的引入不是特设式的，而是明确了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和因果作用，提出了一个总体性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理论解释并不针对某个特殊案例或者某个国家，适用范围得以扩展，解释效力具有一般性。具体而言，斯维勒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解释框架等方面具有以下特色或创新：

首先，概念创新，提出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行为模式。许多学者已经质疑了传统均势理论的制衡预测，也提出了许多替代性的行为模式，斯维勒在研究中首先对与制衡有关的几个概念作了区分和界定，分离出“制衡不足”这一国家行为。在他所构建的国内政治分析模式中，均势理论有关制衡的预测转化为这一分析框架中的一种特例，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拉卡托斯意义上的“进步的问题转化”，（即这一理论不仅能够涵盖传统均势理论的预测（制衡），同时还具有超余的经验内容（制衡不足）。

其次，从关注个别国家的外交政策转向关注所有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和行为模式。在以往的新古典研究中，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国家、某个历史案例或某种特定政策。从社会科学研究类型看，这是一种特例性而非一般性研究；从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取向看，这是对外政策理论而非国际政治理论。斯维勒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特定国家或特定行为，因为制衡不足是一种普遍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国家行为的一般模式，而他的分析框架也并不仅限于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某个/几个国家，他所选取的案例囊括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有关这一现象的主要国家，而且将均势理论通常忽略的小国行为也包括在内，从这一点看，作者试图构建的是一般性理论，而且并不局限于外交政策理论，可以视为对对外政策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的综合。

拉卡托斯对理论进化的论述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第一章。

有关对外政策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的区分，参见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1—72。

应该注意到，斯维勒本人对外交政策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之间的区分持反对态度，见 Randall Schweller,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pp. 321—22。

第三，从单个变量研究转向多变量研究，揭示了复杂的因果机制。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简单的因果关系研究的是一个自变量（原因）与一个因变量（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是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果链条，对这一链条揭示越明晰，越有利于人们对现象的理解。上文已经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涉及到诸多国内政治变量，不同的学者在各自的研究中通常强调了不同变量的作用，但是缺乏统一的核心变量。在斯维勒的研究中，四个单元层次变量涵盖了国家决策过程中的主要国内政治因素，作者详细地阐明了这些变量之间的联系，以“国家一致性”这一概念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四个变量值的变化组成不同的因果图式，形成一个逻辑上严密、经验上可以证伪的分析框架。

第四，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与严格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以案例研究为主的非数量的研究方法也十分普遍，不过，在以数量研究与形式理论占主导的美国学术界，非数量研究常常遭到诟病。近年来，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分析技巧上，非数量方法都臻于成熟和精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此书中，斯维勒结合案例研究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从案例选择的标准到案例分析的过程，从变量的控制与干扰变量的排除，都严格地遵照了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的基本要求，综合运用案例内比较、案例间比较以及过程追踪等分析技巧，对理论假说和因果机制进行了细致而清晰的检验。此书对每一个案例的研究都显现出逻辑上的严密与条理上的清晰，是将实证意义上的案例分析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范本。正如有学者的评论所说，在方法的运用上体现了“作者与案例之间近距离、创造性的对话”。

综上所述，斯维勒从国内政治角度对制衡不足现象所作的解释代表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新发展，这一理论表现出综合体系与单元两个分析层次、跨越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两个研究领域的潜力，从单一变量研究转向多变量研究，有助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复杂性的理解。

代表性的著作是 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5)。

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 "Case Study Methods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bfiel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 No. 2, 2007, p. 180.

四、有待拓展和深化的研究议程

作为一部研究设计明确、理论框架简洁、逻辑推理严密的学术著作，《没有应答的威胁》并非没有缺失。首先，作者对“制衡”（以及“制衡不足”）的界定就容易引起歧义。在对不同的因果图式进行分析时，作者曾提及引起制衡的两方面原因，一种是基于权力分布的变化，一种是基于外部威胁的出现。这两种制衡原因实际上分别对应沃尔兹代表的“权力平衡理论”和沃尔特代表的“威胁平衡理论”，而这两种理论中的制衡概念存在显著差别。根据权力平衡理论，实力分布的失衡会导致国家的制衡行为，在实力对比中处于弱势的国家会通过联合或者自强的方式来应对强势的国家（潜在或实际霸权国），这种意义上的制衡也符合传统均势理论的预测。而在威胁平衡理论中，国家根据威胁大小选择结盟的对象，权力只是影响威胁认知的一个方面，制衡不一定是弱势一方对强势一方采取的行为，根据这种论述，在实力对比上处于强势的大国如果视崛起的国家为威胁，对其进行遏制也是一种制衡。斯维勒在讨论中并未注意区分这两种意义上的制衡，而且通常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讨论制衡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作者并不完全是针对传统均势理论的预测进行驳论和理论建构。

其次，新古典现实主义旨在将不同分析层次的变量结合起来，以解释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为选择，但是现有的研究仍然缺乏将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中的范例，斯维勒的研究也未能突破这一局限。新古典理论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国际诱因—国内政治—政策选择，在纳入国内政治变量后，现有的研究关注的是后一个因果链条（国内政治—政策选择），而没有完善前一个链条（国际诱因—国内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斯维勒对复杂的国内因素的政治作用揭示得非常完备，其提出的五种因果图式可以反映这一点。但是，在涉及国际诱因时，作者仅仅将体系的实力对比或威胁变

Randal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 12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6.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化作为背景，并未指出体系层次上的原因。实际上，制衡不足并不完全是国内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某些结构性制约也会阻碍国家的制衡行为，比如实力差距以及结盟的可能性等。无疑，国家行为是结构制约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对两方面的因果链条都加以完善，新古典现实主义才能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架构国际与国内因素的跨层次理论。

第三，国内政治因素在将国际诱因转化为政策选择的过程中会起到多重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主要关心的是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压力的抑制作用，即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测相反的情况。但是，国内政治也可能加强体系压力的作用，二者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可能是同向的，而不是矛盾的。斯维勒的研究关注了国内政治抑制体系压力而引起制衡不足的情况，正如他在界定制衡行为时所区分的，国家行为还可能出现适度制衡、制衡过度或者不制衡等情况，如果能够揭示国内政治因素在不同条件下起到的作用如何使国家行为发生不同的变化，这一分析框架将不仅仅只解释制衡不足这一种行为，理论体系才会更为完备和缜密，对现实也会更具解释力和预测力。

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在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层次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单元层次之间架构起桥梁，将国家决策和行动的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结合起来，对其加以科学的说明和解释，这是现实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一种“必要而且自然”的演进。近年来，这一理论在内在逻辑的深化和经验研究的扩展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斯维勒的研究代表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最新发展，也表现出这一理论的发展潜力以及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相关性。

在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理论，而是代表了一种具体的研究路径。这一理论分支并未针对某种或者某些经验规律提出带有普遍性的解释框架，而是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挖掘对外政策和行为选择中的国内政治因素。对于现实主义流派中这一新兴的重要理论分支，国内学术界还缺乏关注，除了少数就其理论主张和研究状况加以评介的论述之外，尚未

对制衡行为的结构性制约的分析见，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36—42页。

Charles L. Glaser, "The Necessary and Natural Evolut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in Elman and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p. 266.

出现利用这一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成果。实际上，在史论结合中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实践是该理论的特色，而且不少新古典学者从事的研究与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行为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斯维勒以及其他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的论著所反映出的研究路径，为我们分析和解释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基础，因此，我们更加期待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可以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为丰富和深化这一理论做出贡献。

www.cnki.net

比如，柯庆生的著作研究了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见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沃尔福思的著作涉及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见 William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目前，另一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杰弗里·特里菲拉正在利用这一理论研究晚清中国与明治时代日本在应对外部威胁时的不同反应，见 Jeffrey W. Taliaferro,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 Extractive State,"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2006, pp. 464—495。

作者简介

唐文方 美国匹茨堡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学士学位,1990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97 - 1998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任特邀研究员,1999 - 2000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客座教授,2002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任客座教授。最新著作为: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 - editor , 2007)。

电子信箱: tang@pitt.edu

戴颖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生。2004年在安徽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2007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邮箱: daiy04@mails.tsinghua.edu.cn

邢悦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1992年在山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在山西大学获史学硕士学位,2002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邮箱: xingyue@mail.tsinghua.edu.cn

周方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2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8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2001年)、《东亚安全合作》(合编,2004年)。

电子信箱: zhoufangyin@gmail.com

吴日强 清华大学访问学者。2000 - 2006年在航天科工集团工作。1998年和2000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获得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riqiangvu@yahoo.com.cn

薛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在福建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2004年在清华大学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li_xuecn@yahoo.com.cn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2004年在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在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获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liufeng00@mail.nankai.edu.cn